

与接受。宋代社会曾经出现了选官不如选佛的说法，这是因为当时佛教的风气领先，影响了人们的观念，于是人们认为“三代礼乐”皆在其中。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周王朝最重要的文化特征，就是讲礼的文化，统称为周礼。后出的儒家接受了周礼的思想，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行”的礼文化内容，并将这种以礼为特点的文化作为指导人们的生活准则、行为规范，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在礼文化方面曾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两家的思想发生冲突，东晋时期儒家指责佛教剃发不婚，破坏了中国的传统礼治的规定，违反了孝道的礼节。但是中国佛教在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儒道二家相互斗争中，又发生了相互摄取，最后完全接受了儒家礼文化的内容，这在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的佛教僧人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很多在世俗社会已经失传的儒家古礼，完好地保存在佛教中。礼成为儒佛融通的一个重要途径。

学者强调佛教的礼仪是佛教关于修道与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是为了修道解脱而制定的，也是为解脱目标而服务的。佛教礼仪蕴涵着非常丰富的社会伦理思想，值得我们去挖掘与弘扬。新世纪的中国仍然需要礼文化来提升人们的思想，佛教劝人为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佛教的礼。构建和谐世界，就是要人们安于心灵，用礼文化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发扬大乘佛教利他的精神，让整个和谐社会早日到来。历史证明，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宗教的和谐，宗教和谐才能民族和谐，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所以佛教的礼文化同样可以为当前社会服务。

（作者黄夏年，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

“海峡两岸济公文化研讨会”综述

铂 净

2007年5月8-10日，由浙江省旅游局、台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台州市旅游局、天台县人民政府承办的“海峡两岸济公文化研讨会”在浙江天台山举行，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学者50余人参加了会议，参会的大陆学者有连晓鸣、许尚枢、周琦、丁式贤、马书田、黄夏年、宁稼雨、濮文起、曾传辉、孟领、纪华传、郭立新等，台湾学者有许文笔、张忠良、徐汉青等人。会议收到论文20篇。

这次会议的成果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来：

一、关于济公的生平研究。黄夏年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考释》，研究了《舍利铭》中提到了祖觉禅师的生平与事迹以及祖觉和道济的师父及道济本人的关系等等，指出撰写《舍利铭》的作者北宋居简禅师将祖觉放在道济的舍利铭里来介绍，并且给予相当的篇幅，其中必有深意，道济的原型应来自于祖觉禅师。周琦的《济公李氏家族天台山佛缘考》，根据距济公辈分最近的新史料《太恭人李氏墓志铭》，考出了除已知济公父辈李洙外，又增了一位李宗。郭立新的《济公及文化现象在东阳》发现济公曾在南宋淳熙年间来到东阳八面山大智院（今横店智禅寺前身），见寺院倾圮荒废，心觉大不忍，于是发愿重振旧制。自淳熙壬寅（1182），至淳熙乙巳（1185），历时四载，终得以重修寺

院，留下千古佳话。

二、济公传说研究。许尚枢的《济公传说简论》，将济公的传说予以总结和提炼，指出济公传说主要有三个方面：1、不平凡的身世和少年生活的传说；2、扶危济困和戏佞降魔的传说；3、蕴含民俗风物的传说。济公传说的特点是：一是普世性，二是宗教性，三是与宗教性相联系的神奇性。济公传说的价值在于：1、民间文学的瑰宝；2、民族精神的折光；3、构建和谐催化制；4、道德教育的形象教材；5、文艺创作的素材库；6、开发旅游的宝藏；7、文化交流的金桥；8、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纽带。宁稼雨《古代济公小说叙录》，将有关材料对比梳理，力争澄清疑惑，辨析异同。

三、济公文化研究。丁式贤《天台山济公文化述评》，回顾了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济公研究的历程，指出济公文化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在学术研究上，从济公传说、济公论文，到济公专著的出现；二是在艺术形象上，从传统的济公小说《济公传》，到当代影视作品《济公》、《济公新传》的出现；三是在研究群体上，从个别学者的自发研究，形成了以举办专题海内外研讨为方向的开放型的研究态势。张忠良《济公文化的传播、发展与近况》，对济公文化的传播方式、发展特性和新生现象等方面做了一些观察和说明。认为在具有持续、多元且交互影响特性的济公文化传播发展上，口耳相传、视听表演、写作出版及宗教信仰活动等是促使济公及其故事得以推广并深入基层民众生活的重要方式。

四、济公信仰的研究。马书田的《济公在中国神谱中的独特地位》，强调了济公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和地位远不如他在民间神祇史上的影响大、地位高。许文笔的《台湾济公信仰的探讨》，认为台湾济公信仰横跨教派宗教与民间信仰，以及巫术信仰等不同类型，也就是说一个济公信仰者，他同时也可能是无生老母或恩主公信仰者，这样的现象正是民间信仰具开放性、多元性且融合性的象征。孟领的《济公形象的佛教思考》，认为济公能在千逆万难中不改救世达人之初衷，又是一个可亲可敬的成功僧人。高汉的《“一朵争开火里莲——天台山诗僧道济”》，认为济公作品，于诗于禅有兼得之美。而其语言风格，又有不同于一般诗家和禅师处：既无“金声玉相”之精美，又无“麻三斤”、“干矢橛”之粗俗，走的是平民化但又不拘通常格律的路数。徐永恩的《〈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看济颠之“颠”》指出《济颠语录》首先把济公从人变成神，从和尚变成活佛。徐汉青的《概说济公》指出，济颠之颠，就是融贯了儒释道深邃精义。周琦、丁式贤的《济公罗汉与浙东民俗“跳蚤舞”》，认为舟山渔民的佛教信仰主要是观音、罗汉信仰，《济公戏火神》故事融入“跳蚤舞”，其主旨就在于请“疾恶似仇、佛法无边”的“天台活佛”济公，来当舟山渔民的“保护神”！栗强的《从济公为人下火谈禅家的生命体验》指出济公这样的特殊文化现象，正好成为保真与顺俗平衡演进的绝佳案例，是天台文化中的瑰宝。赵平安的《济公一心为民 力求和谐安宁》指出，济公扶危济困、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拯弱救死、除暴安民、彰善罚恶的种种表现，正是我们当今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所崇尚的，这是济公传说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核心。

天台山在吴越大地一支独放，这里有天台宗文化，也出现了民间济公文化。作为济公故里——天台县，一直重视济公的研究与开发，组织学者写出了大量文章，迄今为止已经召开了二次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集中海峡两岸研究济公的精英，对未来的济公研究将有一个重要的推动。

（作者铂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部编审）